

兴隆场 – 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

（Prosperity's Predicament: Wartime Rural Sichuan as Seen by Isabel Crook and Yu Xiji）

1940 至 41 年，伊莎白和她的中国同事俞锡玑曾在兴隆场花一年左右时间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俾使当地穷苦百姓免受盐价暴涨之苦。该活动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国新教教会的全国性组织）发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新教在中国的联合组织，旨在推动基督教本地化）提供资金、支持，并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批准。美国卫理公会特许项目负责人孙恩三在当地教会属地修建办事处并为工作人员提供住宿。以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实验闻名的晏阳初——当时已从河北定县迁来四川并在邻县成立了乡村建设学院，则派来两位专家进行培训，指导创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伊莎白和俞锡玑的具体工作是在全乡作逐户调查，以期全面深入地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

伊莎白如今已经年迈，由她的儿子柯马凯来介绍她们的项目。

伊莎白的前言

一、地理位置与时代背景：

璧山县城¹位于重庆以西 70 多公里处，两地之间有一条新修的公路相通。从璧山往西，沿着一条蜿蜒的山间小路走大约 20 里地，便来到一个叫做兴隆场的地方。这里丘陵环绕，梯田层叠，在方圆 20 公里的范围内分布着 1500 来户人家，总人口近 8000 人。1940 至 41 年，我和我的中国同事俞锡玑作为一项教会活动的成员，曾在兴隆场花一年左右时间筹建一个食盐供给合作社，俾使当地穷苦百姓免受盐价暴涨之苦。该活动由中华基督教会（中国新教教会的全国性组织）发起，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新教在中国的联合组织，旨在推动基督教本地化）提供资金、支持，并得到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批准。美国卫理公会特许项目负责人孙恩三²在当地教会属地修建办事处并为工作人员提供住宿。以乡村建设和平民教育实验闻名的晏阳初——当时已从河北定县迁来四川并在邻县成立了乡村建设学院，则派来两位专家进行培训，指导创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³。我和俞锡玑的具体工作是在全乡作逐户调查，以期全面深入地了解当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状况⁴。

那时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正处在相持阶段，两年前国民政府刚刚被迫迁都重庆，将四川作为指挥全国抗战、向各战场输送人力物力支援的大后方。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近似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是沉重的负担业已将四川农村经济逼至崩溃边缘，另

¹ 璧山县过去属四川省，现已划归重庆直辖市。

² 此前中国农村地区教会的主要任务有三：福音传道，公共教育及公众健康；随后把注意力转到改善农民生活、推动经济发展上来，希望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孙恩三身为中华基督教会的执行委员，受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邀，从山东的齐鲁大学奔赴四川主持此项试验计划。

³ 晏阳初本人当时不在乡村建设学院，具体工作由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的社会学家蒋旨昂领导的一个研究小组负责。蒋经常光顾兴隆场，对学院派来的两位合作社问题专家给予工作上的指导。我们并不了解那时他还在附近的另外两个乡从事个人调查，见蒋著《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一书（乡村建设学院 1941 年出版）。

⁴ 俞锡玑从上海大学获得社会学学位后，又师从北平协和医学院的浦爱德（Ida Pruitt），接受了进一步的社会学工作训练。我本人先是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心理学学位，然后来到中国，在四川边远地区从事人类学调查和研究。受孙恩三先生之邀，我的调查工作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的乡村建设计划，薪水则由加拿大妇女宣道会支付。

一方面是沦陷区下江人的大量涌入为当地创造了巨大的商品和劳务市场，到处生意兴隆，日后成为洪水猛兽的通货膨胀不过才初现端倪。对四川人而言，1938至42年是给他们带来大动荡、大艰苦、也是大希望的五年。

二、先期准备：

本书内容初看不免驳杂纷纭，这或许能从资料的收集过程与方式中得到解释。在成为入户调查工作的指定人选后，我和俞锡玑的第一项任务——用孙恩三主任的话说——是去感知当地百姓的实际需求，为我们即将从事的乡村建设计划打下良好的群众基础。

投入到这项“感知”任务中去的除了我和俞锡玑，还有一位护士和教员（都是女性）。我们四人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诊所，一所幼稚园，一个妇女识字班，并去小学校讲授卫生学和公民学课程。由于孙主任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这里，各种杂七杂八的事务性工作也落在我们肩上。

教堂就设在有着100多户人家的兴隆场镇一条曲里拐弯的石板街上，居住于此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认识当地人的好机会。镇上三天一集，届时乡下的男男女女都来赶场。我们向他们购买煤、木柴、蔬菜、粮食、牛羊肉、鸡肉、鸡蛋等日用品，买卖过程中彼此也变得熟悉起来。

按照习俗，已婚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虽然远道而来巴不得能有个地方歇歇脚，喝杯热水，再聊上会儿天。不经意间我们的住所和办公地在她们眼中竟成了这样一个类似茶馆的理想去处。大家同为女人，进来坐坐不会引起任何闲言碎语。随着“顾客”人数日增，我们的好客名声愈传愈广，极大方便了日后在全乡范围内所进行的逐户调查。

人们赶场的目的不光是做买卖，还包括求医问卦、探亲访友，或者仅仅来打听消息。而兴隆场的作用也远不止于一个定期集镇：乡民来到茶馆“讲理”以解决争端；哥老会各堂口在饭馆、茶馆或酒铺里招待四方袍哥、举办“圣会”；离家出走的女人和童养媳在郊外溜达，指望被好人家的收留。最后还有文、武两庙，武庙内除了偶尔举行宗教仪式，并设有固定赌场；文庙则是乡政府和学校所在地。乡公所作为乡一级最高机构，肩负收税、征兵、维持地方治安之重任。

需要记录的东西实在太多，为方便起见，我们决定采用编年体例，将战时发生在这里的大情小事如实呈现出来。

三、逐户调查：

对当地农民经济生活状况的逐户调查开始于1941年1月，这时我已在镇上住了四个月，俞锡玑比我先到半年。我们一起设计、油印了一份包含四部分内容的调查问卷：第一部分确认户主的性别、年龄及家庭住址；第二部分涉及土地拥有或租赁情况，以及房屋、农具、家庭副业生产工具（如织布机）、役畜、家畜和家禽数量；第三部分与家庭成员有关，包括年龄、职业、教育程度、与户主关系、是否服兵役或从事其他社会活动等；第四部分调查居住条件，如房屋大小、家庭成员多少、拥挤程度等。

老实讲，当时的社会环境对展开调查工作并不十分有利。政府强行征粮、征兵已经把农村地区弄得人心惶惶，四处匪患猖獗则更是雪上加霜。我们走街串巷不得不带上木棍防身，以驱赶家家户户豢养的用来吓唬盗匪或打鬼的猛犬。好在主人总能及时叫开狗，事实上至5月份当地百姓已将我们视为既无恶意、跟政府也毫无瓜葛的老熟人了。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尽量小心行事。

从一开始我们便试图以串门子的形式进行调查。见面寒暄之后，谈话逐渐转入该家庭最为关心的话题。尽管初衷只是与对方建立良好关系，但这些未经事先设计的交

谈很快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透视农民生活的窗口；带着日益浓厚的兴趣，我们花在家访上的时间也一天天增加起来。而获取资料的过程就像滚雪球，比方说，对一名病人的适当关切会帮助我们得到有关来世、老百姓眼里的致病原因（如得罪鬼神）、治疗方法、各式江湖郎中等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信息。当谈到治病费用，或一人丧失劳动能力有可能给全家制造的巨大麻烦，又会自然而然引出耕地数量的题目，让我们有更多问题可以提出。在另外一户人家，可能老老少少正在帮一名雇来的木匠建造浇稻田的水车，于是租种土地多少、干旱缺水、蓄水田比例及其对双季稻的影响便成为大家谈论的内容。这中间木匠的加入又使我们对他的工作有了较多了解，诸如材料来自哪里，工钱如何结算，活是否忙碌，以及有多少时间种自家田地，——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一次家访的前奏或后续。其他像生日宴会，到场宾客（有时包括巫师），生老病死，甚至挂在厅堂里的一幅字画，正在准备的一顿饭菜，激战犹酣的一场吵架，或者热闹的邻里家庭纠纷，也会为谈话增添轻松且饶有风趣的素材。更重要的是，不管讲到哪儿，生计艰难始终是每一位谈话者（包括其家人）最关注的问题，我们的经济调查工作因此省了不少事。

虽然不是每次家访都收获颇丰，至少坚冰已经打破，我们得以向乡民解释成立食盐合作社、抑制盐价的好处，并以此为契机逐户访问，到了晚上再把调查结果按时间顺序打印出来⁵。

从1月份到5月下旬，我们用差不多五个月的时间不慌不忙对全乡1497户人家挨个走访了一遍⁶，在逐步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同时，也彻底打消了压在乡民心头、以为我们是替专门征兵、征税的政府办事的疑虑。

既然农户各自感兴趣的话题不同，而收集资料的任务与跟他们友好往来相比又不得不退居次位，我们事先便已做好调查表上的提问无法一一得到落实的准备（虽然走访过程中一无所获的情况极少发生），因此在有些表格里只好写下类似这样的注脚：

“以上信息源于对406位土地拥有人的调查，代表516户人家。”

起初因为官方统计数据高度保密，只对政府相关人员开放，我们无从查阅。随着“新县制”的推行，各乡纷纷撤换了乡长，晏阳初派来的两位专家凭借与兴隆乡新任乡长的密切关系，在5月中旬将官方的户口编查结果交到我们手上⁷。两相对照，凡是发现有出入的地方（事实证明为数不少），我们都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调查资料，有时拿得出充分证据证明是政府的统计出了差错。比如某人的登记年龄为45岁，我们作家访时却碰巧赶上他在过30岁生日，篡改年龄的目的显然是为了逃避兵役。然而县政府很快派人要走这批数据，随后又因造假明显发回乡里复查，因此终结了我们的核对工作。

四、野外记录：

这种地毯式调查所提供的仅仅是一幅静态画面，只有将资料按时间顺序重新整理、罗列才能使乡民生活变得鲜活起来。毋庸讳言，建立在逐户访问基础上的调查日志有相当一部分与他们的家庭生活有关。人们——尤其是妇女——喜欢谈论家长里短、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甚至神鬼故事，从其口中更容易听到对于生活艰辛的诉苦与抱怨。

日志中另有一部分内容记录了掩盖在小镇平静外表下的戏剧化冲突，小到街头争吵，大到对簿公堂，其中又穿插有哥老会开设赌场、举办“圣会”，乡公所剿匪、征

⁵ 调查表用中文填写，打字则使用英文。

⁶ 之所以能在短短五个月里做完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与当地好几户人家往往租住同一个大院有关，以致很多情况下我们能一次同时走访三四个家庭。另外到调查末期，从合作社培训班毕业的五名学员也加入进来，我和俞锡玘于是带领他们分头进行工作。

⁷ 户口编查先由各保分别进行，再报送乡公所汇总。

兵、征粮和由此引起的纠纷，军队下乡扰民以及县政府为控制局面所采取的各项措施，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我们的调查工作得以顺利完成离不开下面几个人的大力协助，日志的第三部分便是他们对发生在镇上的大小事件的阐释与评论。年轻的孙忠禄、孙忠尧（音译）兄弟是当地乡绅里的两位重量级人物，虽然不无保留，他们透露的信息对我们了解乡政府内部的权力斗争、人事变动还是大有裨益。与教区监牧刘志光（音译；刘来自兴隆场以外的四川某地）的交谈则为我们理解认识本省特有的风土人情及时补了一课。当然还有乡村建设学院的晏阳初派来的那两位合作社问题专家：张福民和杨晨方（音译）。张、杨二人被地方名流，包括推行“新县制”以来先后委任的几名乡长奉为上宾；在驻扎兴隆场的半年时间里，和我们同吃同住，几乎无话不谈。从他们口中不但听得到对负责改革地方政治的新任乡长的评价，也获悉了合作社筹建工作所遇到的麻烦及过去几年里乡村建设实验的成功与挫折。

还有一位人物不得不提，她便是被我们雇来作佣人的彭嫂。年近 50 的彭嫂是个寡妇；大约 20 年前彭家的日子相当好过，但自从遭土匪抢劫后，她就沦落到孤苦一人养活四个孩子的悲惨境地。彭嫂认识的人多，消息灵通，方圆左近凡是吵架、欠赌债、杀婴、休妻、订婚，没有一样她不知道的事情，而且说起前因后果总能娓娓道来。跟她同样神通广大的是一个叫吴传芳（音译）的小伙子。吴来自一户中等人家，也受雇在我们这里帮忙做事，并成了一名非常出色的线索提供者，直到有一天他因为躲兵役而被迫逃走。

五、自我评估：

如前所述，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日志乃建立于逐户访问、而非抽样调查的基础之上。至于素材的可靠程度，我们坚信它比同时期任何正式调查所取得的资料都更加真实。我们的优势有二，一是调查者本人均为女性，且长期共处之后已为当地人所认同；二是与镇上卫理教会的联系增强了普通百姓对我们的信任。这个有着 40 年历史的教会虽然因为不跟地方官僚势力勾结而无所作为，却博得了清正廉洁的口碑。

日志材料的来源既然广泛，其代表性自不待言。传统意义上的男性一家之主从来不是我们的惟一调查对象，很多情况下老人、年轻人尤其妇女都会参与谈话。尽管受到性别方面的歧视，肩负管家重担的女人并非足不出户，事实上每当处理外面事务，从来少不了她们的身影。同时我们发现，富裕人家或地主家庭的男性家长（多半中年以上）似乎觉得跟我们这样的年轻女人待在一起有失身份，因此更愿意把聊天机会让给其他家庭成员；中小家庭的户主或年轻男人却正好相反，怀着对外面世界的人和事的强烈兴趣，他们每每迫不及待地找我们攀谈。

遗憾的是，有一部分人的情况在我们的调查日志里并未得到应有的反映，即乡下的赤贫阶层或曰“穷人中的穷人”。这些人多半住在筑于高地的泥土小屋里，远离别人的视线之外；男人更乐意将自己藏得严严实实，以免遇上官吏，被抓壮丁，或者受到有权有势人的欺负。至于那些为了有口饭吃，参与（或涉嫌参与）季节性抢劫的人则更是难见踪影。还有因贫穷面临破裂的人家也不会再以独立家庭的名义出现在我们的调查记录里；一旦分家，其成员在我们笔下就成了某某人的亲戚或财主家的佣人、长工。但上述赤贫阶层中的一小部分人却集中住在镇上的一些破烂小屋里，不但看得见摸得着，而且可以说就生活在小镇的中心。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每次家访话题的选择完全不由我们，而是取决于当事人一时的兴之所至。这种漫无边际的谈话以其随机性和内容的多样性弥补了其他方面的损失，固然有不可替代的优点，却在我们最后整理资料时证明效率极低，因为缺乏一个系统的筹划，所能做的只是将众多事例按时间顺序简单加以罗列而已。然而坏事变好

事，最终奉献给读者的是对小镇上各色人等采取不同方式应付种种生活突变的忠实记录。

六、补记：

（一）乡村建设计划及其成员的命运：

食盐供给合作社成立于 1941 年 5 月，但仅仅存在了五个月左右的时间，到 10 月份，原先在镇上垄断盐业、哄抬价格的那个人竟一举当选为合作社主任，至于这一幕的背后曾有哪些秘密交易发生就不是我们还嫌稚嫩的眼睛所能洞察出来的了。不管怎样，现在新主任可以公然打着合作社招牌而行囤积居奇之实，不但继续高价售盐，还能享受政府的减税优惠；更恶劣的是，办合作社的宗旨从此在乡民眼中大打折扣。基于以上原因，此时已离开兴隆场的两位乡村建设学院的专家很快返回并关闭了合作社，而我们为降低盐价所作的种种打算也随之泡汤。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一个外来人如果未曾深入研究了解当地的社会、政治现实，便贸然在传统乡村实行哪怕极小的经济改革将会遇到多么大的麻烦！

合作社的停办同时也意味着乡村建设计划的寿终正寝。在没有任何资助的情况下，我和俞锡玑决定自己动手写调查报告，并请求保留已经填好的 1500 份调查问卷，却遭到孙恩三的拒绝。孙坚持认为所有资料属项目发起和赞助方中华基督教会所有，但同意暂由我们保管一段时间，这样我们就能应成都《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⁸ 编辑的要求起草报告了。

接下来我和俞锡玑搬去成都，将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调查问卷整理表格上面——总共制作出 34 张表格，主要与人口（家庭结构、适龄服役人员多少及教育程度）和经济（土地拥有或租赁、抵押，以及家庭主、副业生产情况，如织布机的类型、数量等等）有关。

然而报告尚未动笔，所有调查问卷便都被要走，我们的生活也从此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俞锡玑先是受雇为成都的加拿大教会医院从事医务社会工作，随后远赴多伦多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并获得硕士学位，回国后在重庆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我自己则奔赴战火笼罩下的英国，与一名西班牙内战时期参加过国际纵队的英国人结婚，婚后我们又进入各自国家的军队服务。在兴隆场进行的一年多社会调查只为我留下数十张表格、一堆散乱的日志，以及当时所写家信和无数难以忘怀的记忆，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眼前这本书的全部内容。

乡村建设计划结束后，其成员各奔东西，以下是他们的简要情况：

孙恩三：孙先生的英文功底相当深厚，曾将基督教义翻译成漂亮的中文，非常符合中国知识阶层的口味。翻译圣经也是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出资赞助的一项事业。然而孙后来所做的事情我们无从得知，只听说他死于 1949 年以前。

朱秀珍（音译）：朱小姐去了重庆的一家教会医院当护士，虽然终身未嫁，却抚养和教育了一大群孤儿。几年前她因病去世。

李文锦（音译）：曾在兴隆场担任教员的李小姐在东南亚有亲戚，后来移居那里并结了婚，从此与我们失去联系。

李秘书：孙主任的秘书，沉默寡言、看上去像个学者的李先生后来显然去了延安。很久以后我们才从其朋友口中获悉，他之所以参加这项偏远农村的福利计划只是

⁸ 译者注：1910 年，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的五个基督教会在四川成都创建华西协和大学（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12 年后，在该校任教的戴谦和（Daniel Sheets Dye）等外国学者成立“华西边疆研究学会”，考察研究华西地区（包括甘肃、西藏、云南、贵州、四川等地）的人文地理和社会发展，并发行英文版《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著名动物学家刘承钊（1900—1976）曾受聘担任杂志自然科学部编辑，而美国考古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首次提出“广汉文化”概念的《汉州发掘初步报告》（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Hanchow Excavation）即刊于杂志第六卷上。

为了躲避当局的抓捕。计划结束后，李途径成都，对朋友声称要去青海，其实指的就是陕北。我们当时可做梦都没想到他会是一名地下党员；印象中他踏实能干、值得信赖，连给不识字的乡民读报纸这样的小事也完成得一丝不苟。

蒋旨昂：负责向我们提供合作社问题专家的蒋先生先是在歇马场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去位于成都的华西协成大学讲授社会学，该学校后来并入四川大学。学识渊博的蒋很快晋升为教授，不到 40 岁就成了系主任。文化大革命中他并未受到过多冲击，大概在运动结束后不久（或者运动期间）因病逝世。

张福民和杨晨方：遗憾的是，我们一直打听不到张、杨这二位合作社问题专家的下落。

（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工作人员名单

1. 孙恩三，乡村建设计划负责人；
2. 陈文渊，主教；
3. 朱秀珍，护士；
4. 李文锦，教员；
5. 俞锡玑，调研员；
6. 刘志光，璧山教区监牧；
7. 徐志平（音译），卫理公会驻兴隆场牧师。

（附）合作社指导人员名单

1. 晏阳初；
2. 蒋旨昂；
3. 杨晨方；
4. 张福民。

（二）后来的岁月：

这里对我的丈夫大卫·柯鲁克应该多交待几笔，虽然他未曾参与兴隆场调查，其政治活动却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当时我正在伦敦经济学院雷蒙德·福斯教授的指导下收集资料写作博士论文，决定暂时中断学业，专门抽出一年时间陪他返回中国，考察发生在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

从 1947 年 11 月起，我们在冀南太行山区一个叫做十里店的村庄一住就是半年，记录下这里的群众实行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我们后来的两部著作——《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1959 年出版）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1979 年出版）——即源于这次调查的结果。

调查活动接近尾声、我们正准备启程回国时，却意外地接到邀请，在解放区新成立的外事学校教授英语。我们曾获准亲眼目睹共产党的工作组如何帮助农民翻身，现在有机会报答主人的盛情，于是欣然前往华北平原一座刚解放不久的村庄，给借住在老乡家的 35 名学员当起了教书先生。形势发展得很快，不到半年时间外事学校便从乡下迁入北京（当时叫北平）城中，并开始扩建为外国语学校（1954 年改称北京外国语学院，即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跟待在乡下的日子相比，学校生活同样丰富多彩且意义非凡，最大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历经种种不无争议的知识分子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之后，我们越来越舍不得离开这个处处充满生机的国家了。

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开展和人民公社的建立，我和大卫决定重返十里店。这时十里店已成为阳邑公社下面的一个生产队，1959 和 60 年的夏季我们两次去那里住了几星期时间，并将所见所闻记入《阳邑公社的头几年》一书（1966 年出版）中。事隔多年以后，原公社书记承认他在当时奉上面指示向我们提供了虚假材料；就在我们一致同意改写此书时，这位当事人却因患癌症离开了人世。至于兴隆场的调查资料，这些年来一直束之高阁，我因为忙于教学，也从未做过什么故地重游的打算——那时的四川对外国人来说还是一块禁地。转机出现于 70 年代末，到 1981 年的夏天，我和俞锡玑终于再次踏上了兴隆场的土地。

（三）一点补充：

这次重访让我们对早年进行的社会调查的价值有了新的认识；一年后我从北外退休，立即着手整理这批久被遗忘的资料。这时俞锡玑的兴趣和事业都已转向别处，写作任务只能由我独自承担下来。即便如此，眼前这本书仍然是我们共同合作的结晶。俞的视力不好，已无法阅读，但每当我将写好的章节念给她听时，总能收获到坦诚而有益的批评、指正和评价。1983 年我们又一次回到兴隆场，目的是去核对写作过程中暴露出的新问题，并顺便了解一下 40 至 41 年间那些曾在当地呼风唤雨的人物的命运。但愿今后能有机会将这次访问的结果公之于众。

我虽然负责本书的最终执笔，当初从事调查活动时俞锡玑却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俩各有所长，在许多方面都相得益彰。她称得上一个合格的咨询师，善于聆听别人的倾诉，同时又不失一个务实的研究者对事物本身所持的怀疑精神；我则去芜存菁，花费大量时间、精力把她收集来的资料加以仔细梳理。迟至今日我才意识到将这些东西整理成书对有关学者来说或许不无裨益。中国一向有“文责自负”的传统，但我坚持在书中使用“我们”的称谓，因为若没有俞锡玑所做的一切，本书也就无从谈起。